

●教育前沿

整体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曹天山

教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作为人类教育活动的理论形态，它是在人类教育思想和理论思维有了相当发展之后逐步形成的，其学科体系的确立只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才能够完成。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体现理论自信,展示世界教育学知识领域中国教育学知识身份认同和影响力量,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要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202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些重要论断指引我们,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已迫在眉睫。

坚持“三化”

加快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时代化,坚持国外先进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有三个重要命题:一是关于教育的性质,论证教育与阶级的关系;二是关于教育的方法,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三是关于教育的目的,主张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教育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述命题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孔子开创性地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主张,创造出“启发式教学”。墨子提出“素丝说”,“闻知、说知、亲知”三知论和“兼士”培养目标,首次提出量力性教育原则。古代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大学》、《学记》、《劝学篇》、《考工记》和《师说》等教育名作。1902年,伴随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成立,现代高等师范教育体系建立,教育学也随之发展,诞生了蔡元培、黄炎培、张伯苓、陶行知、徐特立等教育家,新中国涌现了吴玉章、蒋南翔、于漪、卫兴华、高铭喧、张晋藩、黄大年等教育家,经过持续不断的建设,形成了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和较为齐全的学科体系。

坚持国外先进教育理论的本土化。知识因交流而多元、因互鉴而丰富。国外先进教育理论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借鉴。比如,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1632年问世的《大教学论》,被认为是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肇始;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于1806年出版的《普通教育学》,标志着教育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美国教

●热点透视

口述史研究引导教师涵养教育家精神

阿木古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2025年1月9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要启动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引领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而“讲好中国教育家故事,传播中国教育声音,贡献中国教育智慧”,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出的部署。为此,我们需要积极探索讲好教育家故事的方式方法。口述史是一种收集、保存、解释个人、群体的声音、经历、记忆和观点的研究方法,其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和传播形式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特点,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口述史研究与教育家精神在时代主题、集体记忆、个体生命实践等方面具有多重耦合性,成为讲好中国教育家故事的最佳结合点。作为连接教育家个人生命经历与时代主题的桥梁,教育家精神口述史研究能够重现教育家的成长史和奋斗史,呈现教育家的生命历程和思想理论,对于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深刻理解教育家精神的战略意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开展教育家精神口述史研究的指南。教育家精神根植于中华传统

-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体现理论自信，展示世界教育学知识领域中国教育学知识身份认同和影响力量，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要求
- 新时代的教育学还要回应世界之问，针对世界普遍性的教育问题和人类公共教育问题，形成中国解释，提出中国方案，进而提升中国教育学的国际话语权

育家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提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和“教育即经验改造”等教育观;苏联教育家凯洛夫在《教育学》中首次用马列主义观点阐述社会主义教育学理论,主张培养全面发展的建设者,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训,重视课堂教学和教师的主导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终身教育、全民教育和全纳教育等。上述教育理论传入中国,均对中国教育理论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聚焦三大体系

教育学体系是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和总称。其中,学科体系是基础,是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支撑和载体;学术体系是重点,是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体系是关键,是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纽带。学术体系是揭示学科对象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话语体系是理论和知识的语词表达,是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成体系的学科理论构成学术体系,成体系的概念构成话语体系。

中国的教育学是以中国传统教育经验为根源,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合成的产物。我国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最初从日本中转学习德国教育学,后仍效美国教育学,再学习苏联教育学,改革开放后综合苏俄、引进欧美,并逐步立足本土,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知识体系,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教育学。当前,中国教育学发展应在学科性、本土性和时代性三方面进行提升。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表现在知识要素构成方面,要避免雷同性和仿制性知识;表现在知识形态演进方面,要增加原理性和创新性知识;表现在知识主体融合中国实际方面,要强化本土性和实践性知识。总之,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对本土的教育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又要对国外先进教育理论进行消化吸收。

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要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贡献知识论、原创知识论和自主知识论。一是要构建学术体系,包括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标准。论文是知识传承和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知识创新要依靠教研科研工作者的贡献,而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的研究急需加强。二是要构建学科体系。学科成形需要构

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依据我国教育学科发展实际和高层次人才培养需要,教育学学科从母体学科分化发展,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主要设置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等二级学科。三是要构建话语体系。打造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是构建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基础。中国教育学在解读中国教育实践、构建中国教育理论上应该最有发言权,同时要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这方面还有待加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便于为国际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多年来,我国教育界回答了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形成了素质教育、立德树人、全面发展、“五育并举”、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公平等标识性的概念和理论。这不仅是对中国教育学理论创新的重大突破,也是对世界教育学的重大贡献。

对照三个标准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基础在“知识”,关键在“体系”,特色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逻辑化的概念系统,判断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准主要是主体性、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是构成新的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概念基础。原创性概念凸显“术语的革命”,标识性概念则不仅具有原创性,而且凸显特定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实质内容是用中国理论总结好中国教育经验,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而把中国教育经验提升为中国教育理论;主要标志则是实现“术语的革命”,赋予概念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形成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以当代中国教育发展实际为研究主题,融合借鉴中西方教育研究传统而形成的教育学的知识集成,经过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予以呈现。

应用两大场域

加快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本目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立足中国教育实际,解决中国教育问题。教育学科的价值既表现为对人的身心全面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有效运用,也表现为对教育、科技、人才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理性实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要服务政策供给。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形成了指导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探索了不同时期的教育发展规律,积累了丰富的教育认识,所形成的教育理论引领和支撑了事业的发展。新时代的教育学还要回应世界之问,针对世界普遍性的教育问题和人类公共教育问题,形成中国解释,提出中国方案,提升中国教育学研究成果的国际能见度、显示度和影响力,进而提升中国教育学的国际话语权。

要支撑教材体系。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学术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其建设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凝结于教材体系,通过教材体系建设体现出来。从论文到专著,再到教材,往往是教育学成果演进以及教育学术人才成长的必然路径。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相互影响,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建设就没有后劲。因此,我们不仅要教材体系纳入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视野,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教育学教材体系,而且要将教材体系建设作为抓手,通过教材体系建设引领和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要创新教学、管理和服务体系。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改革。我们要从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推动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学方式变革,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完善惠及全民的教育服务体系。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其构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融通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问题导向与体系追求、外来与本土等关系,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秉持中国教育文化,立足中国时代背景,强化中国表达,讲好中国故事,通过对教育问题的梳理和呈现、分析和解释,着力构建教育学的学术命题、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及其知识系统,进而构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教育学知识体系。

(作者系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本文系该所重点研究项目“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模式研究——以教育学教材为例”[JCSZDXM2022011]成果)

●问题探析

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唐虔

近日,收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滕昭寄来的专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政策话语演变与分析》。作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工作了25年的教育工作者,我很欣慰,新一代的年轻人中有人愿意专注于教育多边组织研究,愿意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总是适时发展的表现,也是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必要条件。

作为全球教育发展和对话的重要平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懈地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各国间合作,对和平和可持续发展努力作出贡献。在过去的70多年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是适时地根据国际社会发展的问題,提出相应策略,并通过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实施相应的教育项目,进而推动世界各国教育发展。比如,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全民教育”理念、2015年提出继续推行“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都得到各国政府的认同和支持。因此,我认为书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引领全球教育理念的精神‘中枢’”的评价是中肯的。

同时,我也赞同书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气质的分析。作者明确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成立以来一直坚守人文主义的立场,这与我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年的工作经验是高度吻合的。与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多边机构不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强调教育的本体价值,强调教育对于人的自身发展至关重要。如书所述,21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就教育是否应该被列入服务贸易这一问题产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前者坚决反对将教育列入贸易范畴,而后者又努力将教育列入教育谈判。最后,双方不得不互相妥协,对“教育服务贸易”这一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跨境教育”的概念,并将跨境教育活动归纳为三种主要形式:人员跨境交流、项目跨境交流和教育机构跨境流动。

书中还系统分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过去70年间“人文主义”自身的发展演变。在其成立之初,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针对二战后教育重建、文盲泛滥和文化阻隔等问题,提倡“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首先必须是普遍的人文主义,不仅容纳全世界人民,而且给予所有的个体人

的尊严、相互的尊重和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其次这种人文主义必须是科学的人文主义,科学的运用必须建立在人类文化的基础之上,科学的实践和理解也必须与人类活动相结合;再次,这种人文主义不是静态的或理想状态下的人文主义,而是不断发展的人文主义,否则这样的工作哲学要么是个体虚伪的谎言,要么就误导我们的工作”。2015年,面对局部地区的冲突不断,教育不平等现象凸显,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文化多样性和沙文主义同时并存,互联网、移动技术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神经科学的进步等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重申,“应将以以下人文主义价值观作为教育的基础和目的: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文化和社会多样性,以及为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实现团结和共担责任的意识”。而到2021年,面对世界各地的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日益兴起,多边主义受到严重威胁,全球新冠疫情等加剧教育不平等的现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再次重申了人文主义的原则。如果说70多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捍卫的是个体在自然和战争面前的基本权利,那么现在,其捍卫的则是人类社会在自然和科技面前的集体尊严,是平等的、团结的人文主义。

这本书也能够很好地帮助大家深度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过去70年间经历过的教育政策的争论、演变及其背后的话语逻辑。从最初的“基本教育”、“教育规划”,到后来的“终身教育”、“全民教育”,再到现在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恰恰反映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纠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天生具有自由主义的气质,这决定了它只可能,就不会放弃对价值理性的不懈追求,这是它的教育政策的基调,也是中国要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话语平台必须采用的话语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抗拒或排斥工具理性,恰恰相反,工具理性不仅是其无法回避的现实挑战,而且深藏于其教育政策话语背后。因此,只有还原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教育活动中的一体性、完整性和复杂性,才能真正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该书做了大量扎实、丰富的史料梳理工作,为我们深度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治理的底层逻辑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值得研究国际组织的专业人员和有志于去国际组织工作的年轻人一读。

(作者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教育助理总干事)

情感支持;要强化国家“优师计划”的实施,以保证每个乡村孩子都能遇到好老师;要通过数字化手段将适合的城市优质资源导向乡村学校。

振兴乡村教育,需要培养培训农业农村高科技人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强化农业科技人才和农村高科技人才培养使用”。农业农村高科技人才既包括种养技术能手,也包括乡村能工巧匠和非遗传承人,他们都是促进农业技术创新、支撑乡村经济和文化等发展建设的重要力量。加强农业农村高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科技、企业和人才等各种发展要素下乡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视乡村地区的创业教育,培育更多“为农、务农、姓农”的企业和合作社等。

振兴乡村教育,需要为农村人口提供全覆盖的支持性学习条件。在终身学习时代,我们要让农村人口也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目标,要为他们创造全覆盖的支持性学习环境。这既包括继续发展好传统的学习资源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报纸、杂志和广播等,也包括建设新型教育资源如网络课程、能工巧匠和非遗传承人工作室等。当然,还需要在乡村建设汇聚上述各类资源的社区学习中心,这些学习中心是学习型乡村建设的重要载体。

(作者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执行主任)